

底色访谈

现任马格南图片社主席、英国摄影师马丁·帕尔(Martin Parr),毫无疑问是当今世界最受关注的摄影家之一。正在广东省连州市举行的2015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上,他以三重角色参加:第一重角色是参展艺术家马丁·帕尔,早在20世纪90年代他就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摄影语言,他的镜头从英国的海滨消费文化入手,剥开一层层时代的外衣,揭露出消费社会种种荒诞和丑态;第二重身份是策展人马丁·帕尔,他和鲁小本&泰斯摄影小组共同策划了“中国摄影书展”,透过中国摄影师的镜头,向观众呈现现代中国的复杂场景;第三重身份是评委马丁·帕尔,他将担任由连州国际摄影年展和谷仓当代影像馆共同主办的“中国摄影书展”的评委,此次书展在国内摄影及出版领域都属首次尝试。

本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上,本报记者对马丁·帕尔进行了专访。

——编者

记者:您对连州和在这里举办的摄影年展感觉如何?

马丁·帕尔:我还不是非常了解这个城市,但这个摄影年展很令人兴奋,这里有很多优秀的作品,我喜欢看到中国与世界的结合,并且展览的向导和指南也很棒,这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摄影年展。关于这个城市本身,我还没来得及去细细探索,它不像北京那种大城市,没有星巴克,这是个不同类型的城市。

记者:这是个什么样的城市?

马丁·帕尔:是的,是小型的城市。但我的意思是,其实这还是一个挺大的城市,但是在中国的话,就只能算是个小城市了。

记者:这次展览名字叫“讽刺家”,是从您拍摄的多个专题中各选一些作品组合而成的,选择这些作品有什么特殊的用意吗?

马丁·帕尔:这次展览是与来自谷仓当代影像馆的收藏家进行的合作。他与托马斯·苏文一起工作,他们一起做了这个提议,这个展览就是这么来的。他想要比较知名的照片进行展览,这些照片也就是他想要买的,所以他买了这些照片并在这里举办了展览。对我来说,这些是较老的作品,这些照片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这里并没有我近期的作品,至少近十年的。

记者:看了这个中国摄影书展,我很惊讶您收藏了这么多中国的摄影书,您这些书都是通过什么途径收集的呢?

马丁·帕尔:这些摄影书来自各个地方,大约10年前,当我开始定期来中国的时候,我意识到这里有很多未被发掘的摄影书。我认为这是个进行更为细致研究的好机会,并使中国的摄影书与世界的摄影书相结合,所以我联系鲁小本帮助我进行收集工作。他住在北京,并且能说普通话。过去8年里,我通过网络、图书市场、与摄影师和经销商会面等方式,慢慢把内容收集在一起,因此这是个耗时很久并且很复杂的工程。

记者:您现在收藏的中国摄影书有多少本?

马丁·帕尔:大概有千余本吧。

记者:这次连州年展有一组作品叫“游山玩水”,是中国摄影师黎明拍摄的,和您的早期作品“小世界”在主题上有相似性,也是关注当下大众旅游现象的,您看过他的展览了吗?怎么看待他的作品?

马丁·帕尔:我喜欢他的展览,喜欢他的想法。不同的艺术家,每个人有不一样的想法跟看法,非常不同。

记者:您有没有想过拍摄关于中国的系列影像?

马丁·帕尔:我过去拍摄过,但这次旅行没有太多的时间,所以没有拍很多。在未来我当然非常愿意拍更多关于中国的照片,中国是个非常有趣而且重要的国家。

记者:您是现任马格南图片社的主席,这是否意味着今后马格南图片社将会更关注中国?

马丁·帕尔:当然,我们是非常郑重地看待中国的。现在马格南图片社正在积极准备关于中国的书。我们会努力展示马格南图片社在中国拍摄的照片。在我担任主席后,优先考虑的就是加快促进马格南图片社对中国的兴趣,因此,可见我们是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件事的。

记者:前段时间,有一位中国摄影师进入了马格南图片社,您对此怎么看?

马丁·帕尔:是的,我们有吕楠,还有一些其他的华人摄影师。我们一直在寻找来自中国的摄影师,不是非常容易找到合适的,但我们在努力寻找,这件事已经在我们的“雷达”上了。每年我们都有招募,如果有人推荐,他们需要填表格,进行申请。他们至少要会说英语和普通话。我们努力寻找这些年轻的摄影师,非常希望能与他们合作。

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国当代摄影?

马丁·帕尔:我认为中国当代的摄影师非常棒,最近他们有很多优秀的作品。我认为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在世界摄影范畴中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角色。你知道,经济较好的国家通常会产生一些较好的摄影师和作品,摄影与经济是联合、密不可分的,正是因为中国经济越来越好,好的摄影师也越来越多,这是件很明显的事情。(本报记者 马列)



《讽刺家》之一(摄影) 马丁·帕尔

按动快门为劳动者喝彩

□ 王小琪

握笔写文章,拍照走四方。这是徐冶同志素来喜欢说的话,也是他一生所钟爱的工作和生活。在30多年的摄影生涯中,他总是不知疲倦地行走在远方的路上,将自己手中的镜头对准劳动中的人民以及他们生存的那片土地。在他眼里,山乡田野,万物生长,是真正的人生场景。

还在很多年前,他就几乎走遍了祖国西南的各个省区,云南的129个县市(区),他去过120个。“时代得有记录,西部要有声音。”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催他不断远行。他常常夜宿边寨山村,尽管那里连“去个厕所都要上坡下坎,清早拍村民出工干活也要爬高上低”。他喜欢乡间早晨特有的气息和动静,“鸡叫狗叫,山村又一天”。天还没亮,他就兴奋地拿起相机出发了。

他曾经说过,行走在高原田野,摄影镜头跟着民歌就能发现无限的美丽,劳作的场景会让图片串起乡土芬芳,按动快门也就是为山民的劳动而喝彩。他的作品多以劳动为题材或直接以“劳动”命名,如《劳动归来米茶香》《劳动的美是圣洁的》《春播红土地》《晒谷场上的银河天际》《谷种由此代代相传》《笑脸跟着艰辛走》《骑着毛驴去放牧》《拉萨的第一批三轮车夫》等。即使是遇到一个难得的机会走出国门,他依然会把镜头对准劳动者和乡野生活。在出访突尼斯、坦桑尼亚和埃塞俄比亚期间,他拍摄了《撑杆出海的海豚湾渔民》《放牧在东非大裂谷》《丰收盛满车》《埃塞俄比亚沙拉湖的渔民分配鲜鱼》《乡间学堂》等一系列反映异国劳动人民生活的作品。

作为光明日报摄影美术部主任,本来他是最有条件出现在各种令摄影者向往的场合、拍下各种历史性画面的人,可他却把这样的机会留给了同事,自己仍然像早年在昆明时那样,三天两头地往乡下跑。他说:“人的活动半径扩展着思维的空间,而我的步履所至大多在边寨山村,蜷居一隅的生活让人安于坐井观天的局限。”

他喜欢田野,眷恋乡村,更热爱那里的人民。他最新的一本摄影著作就定名为《远去的田野》。他欣赏卡帕的原则“不拍没有农民的田野”,并努力付诸实践。在他的镜头中,“人潮与庄稼共沐春光下,仿佛注入了新的精气神”。在观看年轻记者走基层拍回的照片时,我经常听到他问:“人呢?人在哪里?”他很喜欢毛泽东《七律·到韶山》中的诗句“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在他看来,在“稻菽千重浪”的壮阔画面上,是一定要有英雄的劳动者在其中的。“踏访田野,看农户秋收,似遍地英雄下夕烟”,这是他经常的采访实践,也是他源自内心的深切感受。

他拍摄的照片内涵丰富,有文化,有历史,有诗意,有哲思,有情怀,有神韵。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他摄影的特点,我想那应该属于心灵的投影。他说过,在家门口的路上,有的人用脚走过,有的人用心在走;在完成一幅作品时,路途的跋涉是必要的,但心路的跋涉更为重要,更为辉煌;心靠近了,镜头才能接近,作品才出得来。

我在中华书局工作的时候,曾经跟着他和他的朋友范建华先生走过一趟云南。在中缅边境的一家书店采访时,看到他的几本摄影著作摆放在书架上,不禁心生敬佩。那时,他拿着那台简单的佳能G11,走到哪儿拍到哪儿。同去的一些人也拿着同样的相机,看到他拍下的照片好,便赶紧往回跑,跑到他站过的位置,找到他拍过的角度,可风已不是那阵风,云已不是那片云,人也不是那个表情了。

跟他一起出去的人,身体如果不够强健,通常会觉得很累。他不喜欢走马观花,看那些浮在表面的东西,有时会不顾情面地把人家的安排推翻,另起炉灶。即使是行走在城市的大街上,他也会抓住机会穿越繁华,往高楼背后的小巷里一钻,看到做手工艺的、演小戏的、卖蔬果豆粉的和铁匠铺子裁缝店等民生百态,他和他的相机便时时忙碌起来。

他多次提出,百姓平实的生活最值得关注,也最难拍摄,没有事件作背景,没有问题作考量,凭的是摄影师眼光的发现,凭的是摄影师艺术的表现,平淡中见真功夫,一景一物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他经常提醒摄影美术部的同志,每到一地一定要融入当地百姓的生活,面对采访对象要不断地对自己说,近些,近些,再近些。“拍得不好,因为你离得不近”,这句名言带给他诸多启示。他认为,这指的不是一个地理上的距离,也不是镜头和拍摄者之间的距离,而是文化认同的距离。

他心里总是装着受访群众。有一次,他看到一篇摄影报道中写着“当地人”,就嘱咐记者把人家的名字加上,“当地人是谁?人家不能白给我们做介绍啊。”我不止一次地听到他对年轻同志说,采访的时候谁拍了照片,一定要把人家的姓名地址记下来,遇到不会写字的老年人就把他们的身份证拍下来,回来后按照上面的姓名地址尽快把照片给人家寄去。有过时完春节返回山寨,他还会带上一袋面粉给从未见过饺子的山民。

他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人,不为名缰利锁所累,不为权力地位所惑,也不喜欢聚光灯下的生活。一个以提问为职业的人,却不习惯面对记者的问题;一个镜头常伴左右的人,却会紧张于记者的拍摄。面对电视台的采访,他说:“坐在这里并不轻松,对着镜头,灯光、话筒。的确,当我走在乡间,坐在农民家中,就自然轻松多了。”

在朋友们眼中,他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看到年轻

人用网络语言写出的时尚搞笑文字,他也不会觉得轻浅,反倒时常予以鼓励和转发。而细品他的文字,就会发现他严肃和严谨的一面。从只有几十字的图片说明,到上千字的文章或报道,他都会写得凝练、精致,充满人文情怀、学术意蕴和生活气息。参加工作以来,在相机很少离手的情况下,他竟然奇迹般地记满了300多个采访本,这些采访本中的一部分现在就收藏在他昆明家中的箱子内。

对于摄影,他始终处在且行且思考的过程之中。到贵州采访时,他说,拍摄贵州不单纯是要走过表面上的山岭距离,而应该从社会意义中去体验和感受这块土地与人的关系,不用安排,无须导演,一切都是活生生的。到西藏采访时,他说,串起一户户普通人家和一张张鲜活的面孔,等于穿行在西藏的历史和现实间,尤其是知晓了人们遇到什么事情后会痛苦或高兴,那么就捉摸到了高原的脉动。到青海采访时,他说,这里山水相依,村寨相遥,每一个题材都有其个性,新的专题有待串联,更需要以时代的眼光去打量 and 发现,在不断的探索中展示一个青海的新面孔。

“树长高就要掉叶子!”他曾经引用哈尼族老人的这句话来说明摄影人取得成就是要付出代价的。在艰难的采访途中,他几经生死考验。采访西南丝绸之路时车轮飞出差点翻车;独龙江之行随马帮过栈道险落怒江;寻访“马可·波罗足迹”时接连遭遇地震和车祸;还曾经昏倒在海拔近4000米的高原上。车翻了,找人帮着抬过来继续前行;人昏迷了,醒过来吐出一口气继续跋涉。

但是,这一次,他却没有再醒来。在从重庆采访回来的当晚,他永远地睡了。是的,他太累了。从此以后,不会再听到他亲切的话语,不会再听到他爽朗的笑声。他走的时候没有留下什么话,他所要对我们说的一切都在他的作品之中了。



春播红土地(摄影) 徐冶

彩云间草原

心像札记

“洁白的毡房炊烟升起/我出生在牧人家/辽阔的草原/是哺育我成长的摇篮/养育我的这片土地/当我身躯一样爱惜/沐浴我的那江河水/母亲的乳汁一样甘甜/啊,这就是蒙古人/啊,热爱故乡的人。”

很小的时候,蒙古对我来说是一个神秘又遥不可及的地方。我学跳蒙古舞,还会做肩膀不动只动脖子这种难度很大的动作。江南小女生也不知怎的迷恋起粗犷苍凉的草原音乐。

那一大片辽阔的土地现在是北方邻居。我儿子爹拍摄《黑骏马》就在那片草原,影片结尾,男一号腾格尔骑着骏马在血红落日里走向远方的场景,成了经典镜头。那一年是1994年。

有幸于二十多年后我自己也登上了蒙古高原,目的地乌兰巴托。正值北京七月炎热,那边却有十几度的温差,这给我准备行装带来麻烦。我一向知冷知热,干脆带上羽绒衣,事后证明太有先见之明了。我还向女诗人冯秋子学了几句蒙古话,她很认真,找蒙古族演员给我转来录音,轻声细语,抑扬顿挫,好听得如天堂语,可跟着念却比鹦鹉学舌还难。

由于遗传原因,我也是高颧骨,儿子戏言:妈你去蒙古一定被认为是当地人。天有不测,出发前晚,我却高烧不退,输液到夜里。他爹劝我别去算了,我不甘。第二天他送我到汽车前叮嘱:“活着回来啊!”也许二十一年前他在草原拍摄的艰苦经历始终没忘。

带着去受苦的心理抵达乌市,却毫无高山反应,没蔬菜吃的说法也很快被排除。我下榻的酒店临窗,视野开阔,远山连绵。每日清晨大朵云彩飘来遮住朝阳,一座座青翠山峦顿时变成墨蓝。我此行是出席122位国际女艺术家的联展,其开幕盛大,规格之高,出人意料。我的油画《别怕,我的宝贝!》受到追捧,都说最喜欢我画的小狗的眼神。

展余,东道国为我们安排了丰富多彩的节目,观摩了芭蕾舞剧后又看服装秀演出。T型台上,一对对蒙古青年男女朝我们款款走来,高挑挺拔的个头,瑰丽的服饰,脉脉含情,仅有相互眼神的交流,那一刻我被震撼了!

之后,我们一行人前往距离乌市数百公里外的草原。我和三个中国女画家被分配在蒙古包19号。这里没有电视,到晚上只能点蜡烛和油灯。四野漆黑,所有的景物影影绰绰。公厕很远,我们都有点胆怯,倒不是怕有狼,只怕找不回自己的蒙古包。加上没有网络,手机不通,单个行动万一有意外呢,和谁都

联络不了,于是也只好在附近拉野屎了。

更严峻的是这里水奇缺,每人发一瓶水,除了饮用,也用来每日洗漱。那个厕所只有一个洗手盆和两个水龙头。淋浴间倒有一个,老外有晨浴习惯,听说一位“洁癖”真进去洗了,结果冻得哇哇叫。

安顿后,北京女画家胡里问同蒙一蒙古包的姐妹:假如把咱们搁在这儿,能坚持多久?她那副认真的表情,让我们大笑不已。心想要是我自己,只要有起码的水和食物,我会为画画多住些日子。

翌日,星光还在包顶闪烁,我就悄悄起身,但并不下床,只是裹着被子画画,眼前是三个女伴酣睡的美姿,怎能错过?昨晚怕生虫,我们拒绝了义工来烧劈柴。此刻,冷而静。圆形的撑木,四壁的毛毡,所有的细节都逃不出我的眼睛,只听见笔触在本上轻轻划动。

天亮了,女伴们醒了,我的画也画完了。

湛蓝的天给大家带来绝好的心情,清新无比的空气散发出草香味儿,沁入心扉,让我们欢喜得不行,一个个拼命仰面吸气,似乎要像骆驼驮水那样,多储存点新鲜空气带回去对付雾霾。

看得出来接待方在尽力向我们提供优质服务。不说蔬菜少吗,但每顿饭都要摆上几盘绿色菜品,尽管它们比羊牛肉都要贵很多。每到开饭时,挤得满满当当的大蒙古包内,辛苦劳作的,吃得开心的,连同说笑合影的,热气腾腾。而我不改初衷,见缝插针画画,拼命记录着这异国风情。

不知是特意安排还是赶上了当地的那达慕,我们饱览了赛马、射箭

和摔跤。小不点儿的男女孩子悬在马背上飞奔,如鱼得水。壮如牛的汉子们抖动一身腱子肉,信心满满。

策展人说每天都会给我们惊喜,果不其然。一天晚饭后我们集合去看戏。先搭车,后走路,因为到了山地,坡太陡,车开不上去了。原以为是让我们看歌舞表演,但舞台在哪儿呢?好奇的我和大家各找地儿坐下。所谓座位,除了草就是石头,而且还带坡度。不一会儿就寒气袭来让你坐不住。

回国后写信给台湾女画家孝英:“蒙古行的确实在难忘,你发来的照片又使我想起那个看戏的晚上,我俩合盖一件羽绒服,听着夜空中回荡的凄美歌声,那份感动,早超越了国际边界。”

我说的歌声,便是指那晚的歌剧,太出人意料了。一个女演员扮演仙女,完全是独唱,一个人包揽全剧。剧情很简单,仙女在人间怀了孩子,可天上父王命她必须返回,孩子不让带走,她只能忍痛割爱。我虽听不懂唱词,也可以从她诀别新生儿哭断肠的身段动作上看出明白。追光的灯来自汽车上的发电机,都隐在丛林里。一个演奏马头琴的乐手,自始至终坐在一棵被照亮树下。他和女主角的长相都看不清,我后悔没带望远镜出来,只好模糊地对付着看。

最后一天,为画下草原清晨,我们几个相约早早起来。天蒙蒙亮,我有意走远点,在带凉露水的草窝上席地而坐。我又选择全景构图,心想一定要将蒙古包,还有那山脉那天空,一并画进。

这时头顶飘起雨丝,打湿了我的画本,已顾不上。



我们的蒙古包(速写) 赵薇